

復興崗學報

民 99，97 期，1-22

# 軍事決策中倫理理論的功能與效用

詹哲裕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余一鳴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 摘 要

「效率」是軍隊展現它們主要功能—有系統的運用武力—的憑藉。軍事人員在執行任務時，必須即時針對某些問題做決定，而許多問題的決定不僅涉及事實層面（facts）；更涉及價值層面（value），都必然會涉及到道德哲學的問題。而倫理理論最有用的功能就是驅除道德論理的錯誤。熟悉各種倫理之論點，正可增強我們的倫理敏感度。同時，站在教育的立場，太講究所謂的「實用」，很可能使學生成為「落實其先輩錯誤的人」。除非以「理論」來協助我們研究各種經驗及榜樣，否則就沒有辦法把該經驗或榜樣消化。因此，本文首先說明軍事決策需要正確的直覺判斷，並據以說明倫理理論的功能—在使人敏感，及在為衝突的價值、標準排序；再試就反思性道德判斷（單一主體與眾多主體）說明倫理理論的運用，據於證明一位軍事決策者需要「反思的平衡」，以便在關鍵性的時刻做出符合反思性直覺的最佳決策。

**關鍵詞：**軍事決策、倫理兩難、倫理理論、倫理價值、軍事倫理決策

# Function and Utility of Ethics Theory in Military Decision

Che-Yu Zhan

N.D.U.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Yi-Ming Yu

N.D.U.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ssistant Professor.

## Abstract

Military personnel must make the decision immediately while executing the task, and the decisions of a lot of questions not merely involve the aspect of facts; They involve the aspect of value. It will inevitably involve the question of ethical philosophy. And the most useful function of ethics theory is to drive away the mistake normally of the morals. Being familiar with the arguments of various ethics can strengthen our ethics sensitivity. Meanwhile, it is “practical”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o-called one very much, and it will probably make students become “implement wrong persons of their elder generations”. Unless it assists us to study various experiences and models with the “the theory”, they have no idea to digest this experience or model. So, this text proves military decision needs correct intuition to judge at first, and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function of the ethics theory, decision makers must be sensitive. It proves that military policy makers must strike a balance in decision making.

**Key words: Military Decision; Ethics theory; Ethics value**

## 壹、前言

「效率」是軍隊展現它們主要功能—有系統的運用武力—的憑藉。在戰場戰術行動的系絡中，為使得軍事單位在勢不可擋的作戰混亂與壓力下更為有效率，「立即反思的反應命令」的確是某些軍事訓練的目標。然而，隨著科技一日千里及社會人文之演變，人類價值觀混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益複雜，所有的選擇都涉及違反某些道德的限制。這些深刻的道德問題，很顯然存在於戰爭的必要決策的複雜性中，以致使得軍人除了對軍事專業人員的領導統御有著無可避免的壓力外<sup>1</sup>，在國家政策、政府實際運作、與社會行為上也面臨著一個不一致且令人困惑的變化。因此，軍事人員在執行任務時，必須即時針對某些問題做決定，而許多問題的決定不僅涉及事實層面（facts）；更涉及價值層面（value），必須同時考慮價值選擇的正確性、合理性及公平性，否則，常會陷入倫理兩難（ethical dilemmas）的困境中。

基於，思考道德決策不但可以幫助我們對問題的本質有更清楚的瞭解，更可以藉由對道德決策過程邏輯的探討，思考可能的解決之道。同時，站在教育的立場，太講究所謂的「實用」，很可能使學生成為「落實其先輩錯誤的人」。除非以「理論」來協助我們研究各種經驗及榜樣，否則就沒有辦法把該經驗或榜樣消化。故而，本文首先說明軍事決策需要正確的直覺判斷，據以說明倫理理論的功能—在使人敏感，及在為衝突的價值、標準排序；再試就反思性道德判斷（單一主體與眾多主體）中其倫理理論的運用，據於說明一位軍事決策者要具備良好的反思性道德判斷的能力，並希望軍事決策者重視倫理理論的思考與學習。

## 貳、軍事決策需要正確的直覺判斷

傳統上，一般人會怎麼作重要決策？首先，得徹底分析問題，列出各種可能的選擇，依據一套共同標準評估這些選擇及其重要性，拿捏分寸、比較各種選擇，最後選出最適合自己需要的結果。因此，「決策」其實只是選擇得分最高的選項過程；這也可以說是作決定的經典模式。但在實際情況下，這個理想模式運作得

---

<sup>1</sup> 從個別軍人到戰場指揮官，在知道生死懸而未決的狀況下，經常必須做選擇與行動。如士兵必須在危害他們自己與他們單位，及危害無武裝非作戰人員之間，做選擇而行動；高階軍官有時面對是否下達作戰成功勝利所必需，但也可能危害平民百姓生命與福祉的命令，而倍感困擾（Charles, 1973, 202）。

並不順利。

## 一、軍事決策常以直覺為基礎

在現實世界中，人們在碰到情況混沌不明、資訊既少又不確定、時間急迫、風險甚高的問題時，主要是透過以直覺為基礎的過程作決定。「直覺」(Intuition)是一種感官活動的認知能力，感官知覺運作是全面性的(Allchin, 1996)。直覺是將經驗轉譯為判斷和決定的方法，運用辨識出的模式，瞭解究竟發生什麼狀況，從而找出典型的行動腳本，知道如何反應。經驗豐富的直覺決策者一旦辨識出模式，通常接下來要採取什麼行動就顯而易見了。

對於這一過程，對道德意識已充分發展的人而言，就如王陽明所言：「知是心的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自然知惻隱」(《傳習錄上》)。假如道德真理自明無隱，心自能知之，則不須計慮推敲。因此，我們獲得道德價值，就好像獲得其他的經驗內容一樣，我們並不需要加以推論，就能判斷到所經驗到的是什麼。不過，軍事決策者常把察覺經驗的模式視為理所當然，其實這種經驗很難學習。如果不能夠避免受慣性的規則所影響，過分簡化軍事問題的診斷，決策判斷流於求快，將會導致軍事決策品質堪虞。

## 二、軍事決策判斷的偏見類型

通常，經驗法則的類型可區分為：選擇性認知(selective perception)的經驗法則或先驗固著與調適(anchoring and adjustment)的經驗法則、即刻資訊取得(availability)的經驗法則、簡單類化(representative)的經驗法則、與歷史情感的經驗法則，皆對軍事決策產生不利的影響。茲分敘如下：

### (一) 選擇性認知的經驗法則

選擇性認知的經驗法則，意指軍事決策者選擇資訊來符應自己的觀點或信念。換言之，軍事決策者在作判斷時，會根據自己的經驗、人格特質、或意識形態來提供與選擇資訊。基於此，軍事決策實體的詮釋或問題的建構，皆根據軍事決策者所信奉的價值與意識形態，並據此作判斷，這種選擇性認知的經驗法則，常使決策立場趨於僵化，因此要正確診斷或修正診斷決策問題實體，益形困難(Hogarth, 1990)。也會造成「先驗固著與調適」經驗法則的軍事決策判斷偏見(Tversky & Kahneman 1985)。例如，指揮官具有體罰神效的信念，並以此當作處理部隊管理問題資訊選擇的基礎，常會造成選擇性認知經驗法則的偏見。也就是說，當新穎且有用的資訊，但不為指揮官所偏好，該資訊常會被刻意模糊掉，

進而影響軍事決策的品質。這種運用選擇性認知的經驗法則，常會出現容易造成決策判斷的偏見行為。偏見的行為包括：

1. 狂熱的提倡。軍事決策者，極力維持或誇大討論的議題，而產生「過分信心」的軍事決策。
2. 合理化的認知。軍事決策者的思考模式，與自我期望趨於一致，造成別人的資訊，進不了決策體系的問題。
3. 資訊處理的單一化或單調化。軍事決策者，複製因果關係的分析，導致多元資訊難以進入決策體系。

由此觀之，選擇性認知的軍事決策行為，常以一廂情願的立場，診斷軍事決策的問題，導致軍事決策的缺乏創意，容易造成軍事決策判斷的偏見。

### (二) 即刻資訊選取經驗法則

即刻資訊選取的經驗法則，意指軍事決策者，以先前的經驗或直覺，來探索問題實體 (Tversky & Kahneman, 1985)，容易造成軍事決策的偏見。當軍事決策者運用直覺來分析問題時，由於他們可以從記憶裡快速取得有利於自我的資訊，而且在資訊選取的過程中，會壓制多元審視的決策機制，使得軍事決策的判斷機制，流於狹隘。原因在於，直覺是決策者最顯明記憶的運用，「運用直覺當作判斷的工具，將導致決策資訊創意性的不足」(Dutton & Jackson, 1987)。例如，常見指揮官用人皆以親近關係者為主，這些人常給予願意幫他或配合他的印象，存在無法拔擢更優秀人才的問題。這正顯示出，當軍事決策的判斷是植基於自我偏好的資訊時，將會排斥與該資訊差異的訊息，而造成軍事決策的不周全；也會因決策判斷植基於自我情緒激昂的興趣，而導致無法冷靜審視問題，判斷偏見也應運而生。

### (三) 簡單類化的經驗法則

簡單類化的經驗法則，意指決策以刻板印象，當作資訊處理的基礎 (Tversky & Kahneman 1985)。通常，刻板印象常由先前類化的結構規則所增強。例如，當軍事決策行為，受到僵化的組織結構所影響，即是簡單類化經驗法則運用的例示。亦即受僵化結構影響的軍事決策慣性，會造成決策者心智活動窄化選擇範圍的問題，容易衍生軍事決策判斷的偏見。特別是簡單類化規則所產生的制約性思考，也會減少軍事決策的創意性，而且決策資訊也常無法回應問題的需求。因為，以穩定結構當作知識創造的基模，知識的運用注重表像的理解，是難以瞭解軍事行為的動機。而軍事行為意圖的正確審視，常是解決軍事問題的根本，否則組織成員常會創造制度來傷害自己。因此，簡單類化經驗法則的軍事決策判斷偏見，又叫作表像結構經驗法則 (representative structure) 的偏見，常無法有效處理軍事的問題。

#### (四) 歷史情感的經驗法則

決策者常會經由歷史的情感來選擇資訊。然而，以歷史情感當作資訊選擇的基礎，會受到傳統經驗或歷史包袱所制約。當軍事決策以過去的經驗，當作資訊選擇的唯一來源，會以舊有假設當作邏輯演繹的基礎，導致資訊可能服務一個錯誤的決策脈絡，軍事決策品質也會有負面的影響。因為，「決策受過去成功的經驗所設限，則決策者的心智活動，會充斥心理牢獄的禁錮；成功的經驗成為心理依賴的沉澱意識，會忽略組織脈絡改變的診視」（黃乃熒, 1994），是難有周全的問題診斷。同時如果太重視歷史情感對資訊選擇的影響，也會使決策缺乏創意（Koestler 1941），甚至變得毫無質疑的空間，資訊的處理也會顯得偏狹。

### 三、「正確的直覺判斷」需要透過理性剖析

人之所以號稱為「理性動物」，是因為在經過億萬年的演化後，人類有了大、小腦和相關的生理結構。它們是「意識」的基礎。生理學研究發現人的大腦對於理性和直覺兩種意識是有分工和側重的。一般來說，左腦被認為是主管語言、計算和邏輯推理的神經中樞；右腦側重於形象化思維，負責非邏輯、直覺式的思維。理性和直覺就像人類智慧的左右手，前者長於分析與證明，而後者或許對於判斷和創造性活動更為關鍵。

「理性」提供人類的記憶官能，和由此官能而來的分類、比較、計算、以及在既定範圍中「選擇」等的的能力。而直覺的境界，是一種超越理性的內在活動歷程（Bailin 1990）。由於直覺的產生過程猶如黑箱作業，有時是一種潛在的感覺，或是瞬間出現的，因此直覺這個概念有些籠統。有時人們把直覺思維同感性的、或情感的意識活動聯繫在一起，其實也不盡然。往往在情緒衝動時，人不僅不能進行理性的思維，直覺也不起作用。而可靠的直覺往往都是在理智清醒的狀態下產生的。當然，人類所有的活動，有一定的適用範圍，例如在解決問題、達成任務，又企圖講求效率或效能時，通常需要使用「理性」。但運用由經驗累積而來的「本能」或「直覺」，由情緒而來的「衝動」或「感覺」，有時也能達到同樣的目的。只是在成功的或然率上可能有差別而已。

對於大多數的道德行為來說，是依靠我們的直覺或社會給我們的道德規範而做出來的。我們並不時時去測試我們的道德原則，而只是依據它而行動罷了。如果我們的社會或我們的教育沒有給我們一些日常行為可以依據的道德原則，那我們在社會中勢將無所措其手足。因此，有關實質的道德問題的思考，黑爾（R. M. Hare）提出了兩層的道德思維：

#### (一) 為思維的直覺層：

直覺層是人們在已有知識與經驗的基礎上，對事物整體的把握、直接的理解，以及對事物關係的迅速識別，是一種有結論性的判斷，具有非分析性、非自覺性、突發性、跳躍性、直接性與整體性。直覺判斷往往不是以一個步驟接著一個步驟的方式進行的，而是一種瞬間的領悟。直覺對我們的日常行為具有絕大的用處的：（林朝成, 2005）

- 1.它提供了較為一般的實踐原理，幫助我們在日常行為中形成相對地簡單的反應模式，使我們有餘暇去思考（批判層）重要的或不常見的道德問題。
- 2.由於我們人性的弱點，容易在造次顛沛之際「竄改」我們的道德思維，遷就我們本身的利益，或不能公平地考量他人的利益，因此，堅守一般的原則有助於我們做出合乎道德的行為。

蓋直覺層次是指我們大部分人在大多數時間下思考道德問題的方式，由於從小的道德教養和訓練，我們每一個人都將一些道德規則內化為生活中的一些信仰、習慣和處世的態度，而且我們也依賴這些簡單、直覺的道德規則，藉以處理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道德問題，也就是說這些道德規範已經構成我們的人格的一部分，所以人們的行為會避免觸犯這些規則，而且一旦違反這些直覺的道德規則時，常常會產生罪惡感。不過，在直覺中有所謂「未經檢驗的道德信念」（unexamined moral convictions），反應說明的是第一與最初的想法，在面對事件發生時，不假思索的念頭。這念頭即是「前反思的直覺」（pre-reflective intuitions），亦即所謂的自明、不必證明的價值或規範，卻常是社會文化所塑造的自然態度或甚至是虛假意識。當我們面對這些直覺的道德原則互相衝突，或者在特殊情境是否應遵守某些直覺原則產生質疑時，這可能會促成我們對這些原則進行批判和反省、進而修正或甚至拋棄某些原則，這時候我們就進入批判的思考層次。換言之，只有直覺層的道德思維是不夠的。

## （二）為思維的批判層：

批判（反思）思維在於：在道德概念的邏輯特性以及非道德性的事實之限制下，作出抉擇，而不受其他東西的限制，這抉擇就是我們常稱的「原則的決定」（黃慧英、方子華譯 1985）。因為，反思感（reflective sense）是透過建立理想道德判斷的五個判準（1.冷靜 2.理性 3.公平 4.清晰的概念 5.相關資訊的彙整）而起，經由這些判準所建構的道德信念，即「深思的信念」（considered beliefs）。當諸多深思信念為一集合，而諸多道德原則為另一集合時，某些信念可能遭到排除，因為其無法符合集合中任何一個（any）道德原則；相反地，另外一些信念卻是符合任一的道德原則；某些道德原則可能遭到消解，因為其無法符合諸多信念中的部分信念。也因此，將會造成一個狀況是：若我們單一對照我們的任何一個直覺，將無法判別道德原則有效與否。在此狀況中，將對成為深思信念的「前

信念」予以高度的保留與存疑；當確定沒有任何道德原則可以符合這些前信念時，那麼對於是否成為深思信念，將予以重新的評估。因此，需要「反思的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來說明諸多的深思信念與諸多的道德原則間，如何彼此的修正。也就是說檢視道德原則時，以符合反思直覺與深思信念為首要，當兩個道德原則皆符合適當的範圍、精確與一致時，決定性的關鍵即在於何者符合反思的直覺（黃慧英、方子華譯, 1985）。換言之，訴諸直覺將之理解為訴諸我們深思的信念，這些深思信念將是最佳的反思之考量（黃慧英、方子華譯, 1985）。

此外，每一次的道德判斷，不論是直覺或反思性的，都將沉澱在這道德判斷前結構裡，成為其中一部分，一起作為下一次判斷的條件，使這前結構不斷發展、深化，形成一種類似詮釋學循環的道德判斷循環。而且既然無法避免此循環，就只能力求消除其中不合理、錯誤的成分，培養較合理、較具包容性而符合大多數人道德意識之前結構，形成不斷進步的良性循環。換言之，任何個人的決策都需要他完全地瞭解組織的目標和要求。並相應地全盤瞭解備選方案的情況下，才能作出符合組織目標的比較合理的決策，決策的優劣往往依賴於對客觀事物發展趨勢的準確把握和預測。缺乏對客觀事物、決策對象的深層理解和把握是阻礙正確決策的重要因素。

## 參、軍事決策中倫理理論的功能

倫理可以是一套被個人或團體所主張的原則。倫理也可以是研究這些倫理原則的「學科」。學科的任務是分析和評價人類的行為與實踐。Clouser, 在 1997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倫理的兩大功能為：（1）使人敏感（Sensitization）：倫理推翻我們理所當然的想法，增加我們在道德上的敏感度，（2）為衝突的價值、標準排序（Structuring）：要對該情境下所牽涉到的相關倫理原則進行排序、架構，然後再作決定（Clouser, 1997）。

### 一、在使人敏感方面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許多道德信條，而基於這些信念，作出個別的道德判斷及行為來。譬如說，一個人要作出「不應說謊」的判斷時，他顯然是假定了「說謊是不應該的」，換言之，「不應該說謊」是他的道德信念。除擁有許多的道德信念外，我們還會有某些一般的道德觀點，以幫助我們區分什麼行為是道德的，什麼行為是不道德的。這些觀點讓我們鑒別什麼行為是對的，什麼行為是錯的。這些觀點，其實就是一些非常粗鬆的「倫理理論」（ethics

theory)。

任何理論的原始洞識都有其吸引人之處，批判分析指出它的問題與理由，有助於我們澄清問題的所在。對於倫理理論的瞭解，不僅可以驅除道德論理的錯誤，而有助於決策者在解決倫理議題時提供一個思考的準則；更可在各種哲學與思想體系，其倫理學說中，從基本原理，產生若干中層原則，從中層原則產生基本規範，從基本規範產生各種不同層級的法規制度，又在沿用各種規制以斷案之時，產生各種可供後來者依循的判例。祇是，道德理論涉及特定的人、特定的情境系絡、特定的需要，以及特定於這種種參與行動者的特定作為，使得沒有任何問題是可以用「一條鞭法」來解決，更不可能以一個理論解決全部問題（沈清松，1997）。尤其，軍人所面對的許多倫理情境，未必盡有現成法規可以依循，我們無法全部倚賴這些指導原則，因為不可能設下各種的規定完備到足以預期所有可能產生的倫理決策的情形。

不過，敏感的道德能力來自道德知覺，而非道德判斷。因為，道德判斷一定要由充分理由來支持，而不能是任意而沒有理由的，有關道德判斷性質的理論，必須解釋道德判斷與其理由之間的關連。必須能提出正當理由作論據，及指出判斷與論據之間的邏輯關係。而每一個這類倫理學原則都集中了它在不同倫理學體系中得到的解釋，這些解釋在當下的這個原則上相互吻合、相互支持，所以它們成了會通不同體系的重要倫理學視角。在這一意義下，倫理理論也可以說代表了人類的基本道德經驗，不但是我們討論道德爭議時應有的共識基礎，也是一切道德理論是否完整或相應於我們的道德要求的試金石。因此，道德知覺在分辨情境的道德重要性上往往先於依據道德原則的判斷，並能使行為者立即以適時恰當的行動回應。

## 二、在為衝突的價值、標準排序方面

通常，價值是個人的信念和態度所組成，信念、態度和價值形成階層結構。根據經濟學上的用語，價值可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後來，價值一詞已普遍使用在哲學、文學、社會學及科學等，而價值的意義亦有異於在經濟學上的價值意義，它代表著人們對事物的評價和對價值的觀念。但我們每個人對自己的價值觀常不很明確。尤其，真正的倫理困境牽涉到的是，在作為指導原則的兩個甚至更多的核心價值間產生了衝突，而其影響的不是只是技術上的操作問題，它牽涉到的乃是迫使我們在困難的選擇中放棄一些重要的東西及價值觀。因此作選擇或決定時，常感到躊躇不決，莫衷一是，需要利用價值觀澄清的過程，協助我們認識和辯明自己的價值觀，協助我們能公開地和誠實地與別人討論他自己的價值觀，

同時協助我們使用合理的思考來檢驗自己的情感、價值觀和行為模式。

從各種理論的分析介紹中，可知一個論理決策的制定必須涉及多方面的考慮，而且可能隨著決策者採用不同的理論便可能做出不同的決定。但其實這種對多元理論的需求，正表示出每一個理論都是不完整的，及論理議題之多重本質。倫理議題的分析目的是找出與議題相關的事實，以便確認利害關係人之關係並擬定可行之行動方案。當我們學會識別可用以指導行動的基本倫理原則，對一個事情有了倫理的敏感度之後，接下來的下一步就是要對該情境下所牽涉到的相關倫理原則進行排序、架構。在這個步驟中，透過體系性的架構相關倫理原則，我們可以進一步地對一些模糊籠統的原則概念加以釐清，並藉由對話、討論來建立作決定所必要的共識。在很多時候，這個活動並不太困難；可是，有時候這個活動牽涉到另外兩個行動：

- (一) 是有力解明為何這個道德規範才是正確的道德規範；
- (二) 清楚指出這個道德規範的內容與範圍，使我們知道當引用這個道德規範時，是正確的應用而非誤用。換言之，即是需要正確地引用一些正確的道德規範。而一個正確道德規範的抉擇，必須事先作最大努力，對不同抉擇所會帶來的不同後果，作深入研究及合理估計。

而理論與實務間的落差是必然的事實，其原因在於任一理論的產生與發展皆源於特定的情境，而且任一情境都是獨特的（Giddens, 1988）。因為情境是由時、空所交錯形成的，而且這兩者皆存有極高的歧異性，所以他們交織形成的眾多情境中便不易有一致性、共同性。也就是說，彼此的特性、特徵、形態等有很高的歧異程度，某一情境的人類社會活動形態、特性將異於另一情境產生的活動形態、特性。這種情境的獨特性及與理論形成的關聯性便意指到理論與實務存有落差的事實，更進一步地，我們無法全部倚賴這些指導原則，也不可能設下各種的規定完備到足以預期所有可能產生的倫理決策的情形。因此，釐清理論與實務二者非本質的相關而只是在理想發展過程中的扭曲變質。

## 肆、軍事決策中倫理理論的運用

倫理決策的決定係在兩種或更多種幾乎同樣不被期望中擇一的決定過程，也是一種在困難的選擇中不斷地斟酌考量的過程。在倫理決策過程中，「要或不要的判斷」雖有價值判斷包含其中，但「該或不該的判斷」，才具有倫理與道德的意涵。倫理判斷，誠如前述有直覺性與反思性兩種情況，反思性道德判斷依其涉及的主體又可分為兩種：如果是單一主體（個體 micro）之反思，是一種道德兩難；而通常稱為道德爭議的，則為眾多主體（總體 macro）的反思判斷。

## 一、在單一主體之反思上

倫理決定之所以容易造成困境，多半是因為其中有「人」的因素，尤其當其中有個人直接的利害相關時，尤難抉擇。這種「單一主體」之反思，是一種道德兩難；Walter Sinnott – Armstrong 認為（1988）所謂「道德兩難」的定義是：「所有且唯獨只有那些情況，其中一行為者在同一時刻有兩個選擇，兩者各別來說皆應採納，要兩全其美卻又力有未逮」（Sinnott – Armstrong， 1988）。就組織理論而言，成員個人之倫理困境莫不來自於其權威、角色，及利益上之衝突。

### （一）找尋軍人角色衝突的倫理根源

作為一個職業軍人，在面對國家安全事件的時候，都會出現類似的兩難選擇。他既是國家安全的捍衛者，以滿足國民生存發展為最高職業追求，但同時，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社會公民，他又必須遵從相應的社會道德規範，角色衝突中，職業理念和社會道德的對抗在所難免。通常，軍人的角色衝突來自於：

第一個重大壓力，涉及權力的道德運用。職位越高，則問題越複雜也越不精確。道德的情況就更模糊不清，也不太受制於特別的規定和簡單的辦法。

第二個重大壓力，則是涉及軍隊兵力的運用道德。

除開這兩種主要的道德壓力之外，每一高級軍官還將會面對其他的一些壓力，雖然其方式可能會各有不同。有一種道德壓力是，對某一個人很公平合理的事，可能會與試圖糾正長遠不公正的一種政策相衝突。另一道德壓力，是忠於組織立場或政策與堅持個人信念兩者發生衝突時的問題。其次，是人與任務之間的問題，例如軍事任務與妻子生產孰輕孰重？最後一種道德壓力，是有關誠實與欺騙之間的差異。這些壓力，將需要你具有一種道德價值觀念之基礎。具體而微論之，則可因組織中不同層級人員之分類，而歸納不同的倫理困境。舉例來說，「忠誠」、「政治中立」等，雖是任一階層應共同遵守之倫理原則，但若更進一步論述，則因不同層級有不同的服務對象，因而有不同的忠誠實質具體內涵。甚至不同時空環境下，亦然。在民主化潮流下，行政人員應加強對「民意」之重視及忠誠；或基層人員應謹守政治中立，但公共組織領導者往往因為執政黨之更迭，而隨政黨屬性及偏好而異其立場。

此外，組織領導者以其決策角色故，尤須加強其「決策倫理」，亦即組織領導者從事決策時，必須考量所作政策決定可能造成長期及外部性的影響；基層人員因為負責實際政策之具體推動，因此首須著重其服從上級指揮之階層倫理，以及為達成任務所須遵循之專業倫理等。至於組織之中級主管，就層級角度而言，上承領導者之命執行政策，對下則要監督管理部屬；就功能角度而言，則兼跨政

策制定與執行功能，因此，其角色扮演要較其上之領導者或其下之基層人員更為多元，所面臨之倫理困境也更複雜。

就公共政策「決策樹」(decision trees)而言，組織成員雖有層級劃分，但卻沒有明確的職責功能界線而有重疊性，例如領導者擔負大部份的決策功能，也承擔一部份的管理責任；基層人員雖然專司執行之責，同時也被賦予部份的裁量之權。換言之，不同階層者，其所面臨的倫理困境是截然不同的，所做的倫理具體相應措施也無法彼此流用。尤其，軍事組織是一個相當特別的組織，它具有單一而絕對的命令服從取向、嚴密且複雜的科層體制、崇尚倫理道德取向、絕對的任務導向而非利益導向等不同於一般組織的特質。軍隊最明顯也是最重要的特質，便是階級分明。這一套上下分明的階級系統，比起非軍事組織，更能充分反映它階梯式工作層級的特質。

軍事組織所強調層級節制與分工明確的意義，便是組織結構能依照某種標準，將組織所有的職位排列成高低不同的等級，然後再根據某些標準，將成員分派到各種職位上去執行種種職務。在運作方面，為了確定每個成員都能瞭解組織的要求與規範，且避免因為個人的情感、意念影響組織運作，軍事組織必須建立一套正式、明確的規範以及非正式的文化或是「角色期待」，透過「組織社會化」的影響，來形塑與激勵個人完成其角色功能。簡言之，「角色制度」是一套依組織需要與目標而形成的「地位」(status)與「角色」(roles)的組織體系，也是組織為模塑與激勵組成份子完成角色任務，發揮角色功能而形成的「規範」(norms)與「價值」(values)的體系。正式的地位界定與角色規範，是軍事組織中必要的功能性需求。

從軍隊的組織目標來看，其形成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國家主權不受侵犯。因此，軍人的每一次角色衝突首先要牽涉到就是社會利益、國家利益以及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問題，其避免角色衝突的方法之一就是先將自己所承擔的不同角色在時空上加以區別，在一定的條件下集中承擔一種角色。

## (二) 角色衝突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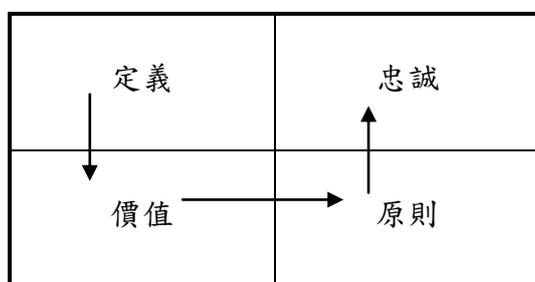
當然，每個人心中的量度不一，在不同原則與價值觀影響下面對倫理困境的決策迥異。因為，價值是個人的信念和態度所組成，信念、態度和價值形成階層結構(Rokeach, M. 1968)。價值可視為一種抽象的理想，它代表個人行為的理想模式(ideal modes of conduct)或理想的終結目標(ideal terminal goals)。道德判斷是包含一個價值詞語的判斷。道德義務判斷不但可出現在不同的道德觀點之下，也可以在相同的道德觀點之下，如同屬某一特定的社群或文化背景之下的個體，對同一事件產生爭議時，如果不是彼此在推論引用共同的道德觀點上有差異，則往往是由於對同一事件的理解出現分歧。這一類的爭議則可以通過對事

件的相關認知達到共識而化除；但是，所謂「認知」又常與對事件的詮釋，特別是涉及價值和可能產生的後果有關，常有價值的因素在內，並不容易消除。尤其 20 世紀後期社會快速的改變，文化結構和個人價值觀瞬間改變成個人目標為優先考慮的事。Hamman 把角色衝突定義為『真實角色和被預期角色的不一致和矛盾程度有多少』這矛盾的結果來自組織的需求和個人價值觀的衝突（Hammen, 1977）。不同的社會環境產生不同的角色衝突。

軍事工作者遇到倫理困境時常採「功利取向」（utilitarian approach），希望決策基礎是為「最多數人追求之最大利益」（the greate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但其最大問題在於，究竟誰才能決定什麼是對整個社會最好的利益，而最好的評判標準又為何？這些問題易使倫理困境最後落入某一特定個人抉擇。在這種情況下：軍人作出怎樣的倫理選擇才是正確合理的呢？作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軍人的選擇取捨行為無疑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因此，我們有必要建構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倫理秩序，以此引導軍人健全、理性的精神訴求。

我們知道，在角色衝突中，軍人道德選擇的痛苦根本在於：在複雜多變的現實境況下，應該對誰負責，應該忠實於誰的利益才是公正合理的？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們很快就會清楚自己應該怎樣去做。在此，我們以社會倫理學上著名的道德推理模型——波特圖式 改進的表，作為指導軍人協調角色衝突的精神框架，亦為倫理選擇模式提供理性鋪墊。而 Contemporary Media Ethics 一書的分析架構中，更以哲學倫理理論為共通刻度的量尺，此一作法或猶有誤差，但至少已經歷了制式的思辨過程。這本書的作者群之一 Edmund Lambeth 在第一章即提倡，以反思辯護（apologetic）方式分析倫理困境個案是磨練個人道德思考（moral reasoning）的最好方法。

概而言之，波特圖式（如附圖）以其形式的簡約性和內容的明達性勾勒出一個具有「實踐—精神」雙重品格的有機循環體系。其道德推理圖式正是將行為主體所面臨的倫理衝突以清晰直觀的圖式展示出來，便於行為者進行倫理道德選擇並做出恰當的行動決定。



（附圖為波特圖式簡圖）

圖式各步驟並不彼此獨立，而是有機地聯繫著，我們可以針對分歧的根源展開多次反復的探求，在一個不斷澄清事實和重新定義的過程中，使每個方面都得到更詳細的論證，繼而使其與其他方面聯繫起來。

不過，在分析方法上，修改作者之一 Christian (2004) 先前所推薦的道德思考架構「波特盒子」(the Potter Box)，並補強其缺少哲學基礎的缺點，再吸納 Lambeth (1992) 提出的五個原則：真實、正義、自由、人性與組織重視的管理目標(stewardship) (Lambeth, 1992)，進而延伸出「決策分析金字塔」(Pyramid Model of Analysis) 的分析架構，藉以應用於倫理困境的判斷。此一修正，是在執行上述步驟時先行選擇各自依循的哲學理論基礎(即前述功利與社群取向)，並將 Lambeth 之五原則依重要性排列，接著加入關鍵人物排序，推論出所有可能狀況後始作出最後決定。在面臨困境進行道德思考時，波特盒子有幾項重要步驟：定義事實、認清價值、找出競爭原則、決定哪些是關鍵人物(loyalties/stakeholders)。

根據此一圖式引導的分析路徑，可以幫助我們確定哪些最容易產生誤解的地方，從而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衝突的真實層面，最終構築軍人在角色衝突中的行動指南：

1. 情景描述，指出發生了什麼，現實情景是怎樣的，並且加以充份掌握。
2. 價值方向，一般來講，其有效的職業價值觀就是忠實地服從國家。
3. 倫理原則，軍人的倫理原則在於保家衛國？對於案例中的軍人來說，他認為他這樣做是在為最大數人的最大利益服務。
4. 忠誠選擇，指思考這樣做到底是為了什麼？軍人的行為選擇需要準確地表明忠實於人民。

故而，波特迴圈模型還為類似事件的發生提供進一步評價的價值觀和原則機制，可用於確定類似事件發生時，採取什麼樣的方針來規範行為。其實例操作是先要描述整個案件始末(case narrative)再定義面臨的困境事實，接著依功利與社群取向提出原則與價值，繼而排列關鍵人物的重要性。在列出可能情境(scenarios)後，即經由上述推論產生解決方法或是描述當時主角所採行的決策(case resolution)。同時，更要透過哲學基礎的分析架構，一一檢視倫理困境中關鍵人物的重要排序，才能推論出可能情境並從中找出決策，以縮小因個人判斷所導致的誤差。

## 二、在眾多主體的反思上

相較於道德兩難，道德爭議是一更複雜的問題。因為它不僅是一個而是眾多

主體之反思，涉及不同的道德判斷前結構之歧異與矛盾，因此所需之倫理及經驗知識也更繁瑣。由於軍事人員最基本的要求在於其對組織領導者、直接主管、其服務對象，以及對民主社會基本價值信念如公平正義的忠誠，因此其倫理困境來自於必須在此一各個分子密切互動的「開放系統」，以及多元的備選方案中作一抉擇。

### (一) 道德原則的判定

道德爭議最道德上兩難的問題大都牽涉到當事人和他人間在需求、權益方面的衝突，這些需求、權益可能是金錢、權力、親情、友誼、愛情、生命、自由等等，對每個人而言這些需求（權益）都具有不同的價值（重要性），當個人需求（權益）與他人的需求（權益）產生衝突，必須在衝突的價值間做取捨才能解決問題時，便產生價值或道德衝突，因為選擇了某一項價值就必須犧牲其他的價值，人們是否能依據較高層次的道德原則做取捨。畢切普（Tom Beauchamp）曾將那些已成功化簡並部分解決道德爭議的方式整理如下：（雷克勤等譯 1990）

1. 許多道德分歧起因於道德爭論的各種觀點所針對的事實。獲得這些事實之關鍵性知識則至少可以部分地解決道德爭論。
2. 爭論可以通過使雙方在概念和定義中達到一致而解決。在某些情況下，規定一個定義或清楚解釋所用術語的意義，對於解決爭端可證明是充分的。後設倫理學在這方面有很好的發揮，可惜卻多用在證成而非解決分歧上。
3. 爭論雙方若能在一個共同的道德原則框架上取得一致，道德問題的解決將變得容易些。
4. 使用例證和反例證有助於道德爭論之解決。這正是法庭和辯論比賽中推理模式之翻版。一方詳細列舉事實的證據論證自己的主張，另一方提出許多反例駁斥其論點，結果分歧雙方中事實證據佔上風者往往顯得是正確的。
5. 指出一方論證之前後矛盾、或其意料之外的後果。揭露一論證導出的結論不是提出者準備捍衛的或事先預期的東西，則其或須改變其論證，否則就須承認論點佔不住腳，有助分歧之消彌。

在這五種方式中，除了第3項以外，其他四項實際上都是涉及事實認知上的差異，遂而不是在義務上的衝突或基本道德原則之分歧。是要針對某件事選擇我們的價值取向，首要的任務當然是要查究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掌握這件事的事實真相。相干的事實，並不限於已發生的事情，也包括將會發生的事件。換言之，我們要充分考慮到將要採取的行動，可能會帶來甚麼後果？這後果是否就是我們所期望會發生的？事實的瞭解的確有助於我們解決道德難題，但僅就事實我們往往不知道應該如何做。故皆直接仰賴知識或經驗的幫助，知識越豐富就越能在這四種方式的運用上得心應手。

真正有關道德衝突或分歧的是第 3 項——建立共同的道德原則框架。因為這正是對原則或義務確立一優先次序，以助定奪。這種架構之建立，正是基於倫理知識形成的道德前結構以及開放的討論與道德視域之交融，在不受私利或激情、偏見之干擾下達成。因為，很多當代道德問題之所以令人困擾，原因之一是因為事件本身就非常複雜，我們若對事件的真相沒有全盤及充分的認識，光憑一股真誠或良心去回應，所作的道德判斷可能是相當盲目、膚淺，或片面的。

再者，一般人很少覺察到正確的世界觀也是正確的道德判斷的座標之一，因為一般人很少自覺到自己的世界觀，及對它作深入反省。可是，不自覺它存在並不就表示它真的不存在。事實上，兩個論點之所以有分歧，可能是源於它們接受了不同的世界觀；選擇了不同的道德規範；或對事實真相及行動後果有不同的理解。因此，「道德判斷」又與「道德推理」發生關連。道德推理的概念，即是包括這一過程的全部方面與全部階段，並非僅局限於抽象思維或與這一活動有關的純形式邏輯分析。這樣便呈現出一更現實的和完全的圖景，由此也可以看出，關於道德推理，不同的學說會有不同的側重。以安樂死的爭論為例。贊成主動安樂死的人說，仁慈殺人是合乎道德的，因為是於仁慈惻隱之心。反對的人卻可以說，他們也接受仁慈惻隱這個道德規範，可是卻不同意殺人是最仁慈的表現。換言之，正反雙方可以是目標相同，手段各異。雙方都同意目標及價值取向是減輕病人的痛苦，可是在手段上，一方認為事實是只有把病人置於死地，然後才能減輕他的痛苦；另一方卻認為，事實上還有其他辦法可減輕他的痛苦。

故而，「做決定」的最大認知差異是在「背後的世界觀不一樣」，這是我們「做出道德判斷」的基礎。解決道德衝突即是解決原則間的衝突，而正確地選取初步原則乃是避免道德衝突的積極作法；而一旦有「偶然地」原則衝突的情形，經由批判思維來裁決則是處理道德衝突的消極作法。換言之，道德推理包括「根據社會的善和正確來描述、評價、和判斷」。它包括所有的認知過程，人們由此得出結論並表示關於正確和錯誤的意見。倫理學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隱藏在我們日常道德判斷後面的世界觀發掘出來，及指出不同的世界觀會帶來怎樣不同的價值取向。而一個合理的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的程式之運作是批判思維的主要功能，其目的在於獲取道德判斷和道德原則。也就是說，我們要根據背後一套價值觀，才能做出什麼是「好」或「不好」的評斷。這個判斷沒有「對錯」意義。因此，做判斷必須有根據一個特定角色（role）的診斷標準。除非我們能說明我們根據什麼「目的」做出評價。

## （二）價值層級的排列

在任何社會中，我們都能看到，總有一部分人所持價值觀念超越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社會體制。持有獨特價值觀念的人，往往在其所處的那個時代，被當

作怪僻、瘋子或異端，遭受嘲弄甚至迫害。其實，價值觀的內涵遠超過與其性質相似且易於混淆的幾個概念：需要（needs）目標（goal）、信念（beliefs）態度（attitudes）、興趣（interests）及偏好（preferences）」。採取不同的道德觀點不但常涉及對價值層級的不同排列，也同時影響當事人對相關事實的認知和詮釋。

但是，價值觀是一習得的概念，反映出個人所要的，不論是內隱的或外顯的；同時亦是一個假設性的建構（Construct），為個人或團體於抉擇時，用作判斷及引發行為及投注的要準。也因為價值是因時間、空間、民族性、文化性的不同而有差異的；縱然在人類不同的文化區域中，我們可以看到價值觀念的重大差異，但是仍然有可能找到某些基本被大家共同認可的東西；縱然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人類的價值觀念紛繁多樣並一直在變化，但是仍然有可能找到某些具有連續性的和相對穩定的東西。

事實上，價值是個人人格結構的核心，也是社會型態的反映。價值觀包含著認知、情感和行為的成份，並影響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對不同目標或事物的抉擇。而人的道德是隨著年齡和經驗的增長而不斷發展。我們如果把一個人的價值觀按強度大小排列，則形成這個人的價值體系（value system）。這種系統附著於文化模式與社會規範中，成為評判個人行動是非、優劣、與美醜的標準，它同時也內化於個人的人格中，隱約地影響個人對行動方式的取捨。因此，當我們在作判斷時，也就不能不對價值層次作有效的區分與選擇。這樣的作法——把那些連續性的、相對穩定的、被大家基本認可的東西找出來，對於我們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 （三）倫理規範的辯證

傳統倫理學的理論論證方式十分簡單，即從獨立於其他判斷的、不證自明的、先驗的或永恆的理念出發，就可以直接或間接地產生出所有重大的道德判斷。將這些以幾條基本義務和幾項重要規範的形式體現出來的道德判斷連接在一起，就能夠建構起一座可以解決所有道德問題的倫理學體系。而這些道德判斷具有絕對真理性的洞見的特點，是最後的、無可辯駁的絕對標準。

當然，基於倫理源於生活而不是相反的邏輯，僅僅把道德放在實自然界，只見「實然」不見「應然」，就等於取消了道德，否定了道德。儘管，沒有單一的一個倫理理論可以完全引導決策者每日的行動，但是決策者應該可以在每個情境下活用可行的理論論點與策略，甚而發展屬於自己的決策理念。

當我們批判一個人所做的某事是不道德時，我們要一併對其身處的時代與社會關係做一深入瞭解。並且在字義上更要理解不同時代上的字義解釋，以免在日後的時代做了錯誤的引用而完全沒有考慮某一道德教條在不同時代下的情境問

題。因為只有在充分利用理論之見解來瞭解倫理之原則，才能開闢倫理思考及討論之空間。換言之，只有以這個形式去討論道德問題，才可避免不必要的情緒糾纏，客觀地及開放地反省問題，去除獨斷，摒棄偏執，達致理性的道德。故而，理性的判斷，必先始於多元的認知，倫理理論最有用的功能就是驅除道德論理的錯誤。熟悉各種倫理之論點，正可增強我們的敏感度。

在近代哲學中，特別注重「實然」與「應然」的區分。實然是指實際是怎樣的，應然則是指應當是怎樣的。從「實然」的角度看待軍人角色衝突中的道德行為，其中包含的軍人道德生活的現實、包括軍人的道德選擇境遇、社會輿論對軍人道德行為的評價等等，為規範化的思考提供一系列活生生的經驗材料，通過認真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充分的理解和關注，必然有助於對規範的道德原則、規範的合理性進行實踐的檢驗與論證。

按照批判理論家所主張，理性形成理論，理性是一種否定的思維，而理論本身就具有實踐性格，可謂「實踐」就是「理論」的意義。由此推之，實踐也同於理論，是以一種「否定的行動」（Negative act）來展現。故批判理論家們常會主張「反體系」、「反傳統」。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Adorno, 1903~1969）就曾在《否定辯證法》（Negative Dialectics）中明確說明：它是以否定一切為基礎的「反系統」和「反神學」（歐陽謙著，1988）。但是，在擬定行動策略和傾向時，還是得考慮不同地區文化型態的特殊性，亦即必須得先瞭解群眾賴以存在的文化脈絡，而採取適當的行動策略。因為行動者是群眾，而群眾之合一與凝聚靠的乃是文化力量。若不顧文化傳統而一味反傳統，則否定行動常常是在未「啟蒙」群眾前就消滅了。所以，當我們的批判走到實踐面，開始擬定行動策略時，就必須注意尋求「否定—文化」間的辯證點。這絕非妥協或肯定文化，而是必須以更審慎的方式，認清立足點，而尋求實踐方法。這種分析的方法，當代社會科學有兩種理論：即實證主義者理論與規範性理論（positivist and normative theory），前者強調價值的中立、經驗驗證程式的運用與事實的探求；後者則著重價值的主張、倫理與道德規範的辯證。所謂倫理的辯證是指一種對於價值選擇的推理過程，它包含三種標準：

- 第一、清晰性（clarity）：價值選擇的推理，應該提出清晰的命題，例如，羅斯的正義論就擁有此種清晰性，因為他提供了明確分別一個公義與非公義的社會程式。
- 第二、一致性（consistency）：對於價值選擇的推理，應該提出內在一致性的命題，它們不會彼此相互矛盾。
- 第三、通則性（generality）：對於價值選擇的推理，應該提出通則性的命題，可以適用於各種不同情況，而非某種特定情況。

在如何應用軍事行為的爭論中，我們也可作同樣分析。比方說：公義與愛，懲罰罪犯與愛人，節儉與慷慨，勇敢與謹慎等。其實這些德行並不相斥，例如：一個罪犯，已經侮辱了自己，所以處罰他，等於彌補他的創傷，治癒他在人格上的損傷，並恢復他原有的尊貴。如此看來，懲罰正是最高操的愛情。此外，若慷慨而不節儉，就成為浪費，勇敢而不謹慎，則為愚勇。許多表面是自相矛盾的德行，仔細分析即可發現，它們不但得以並存，兩且是互補的。

因此，掌握了道德判斷的三個座標（經驗事實、道德規範，及世界觀），是有助於我們在這些紛亂的爭論中，去分析各個論點背後的論據，使我們知道彼此之間的分歧，關鍵在哪裏，也使我們可以判斷哪一個論點及論據較合情合理。換言之，理性的判斷，必先始於多元的認知，因為只有在充分利用理論之見解來瞭解倫理之原則，才能開闊倫理思考及討論之空間。

## 伍、結論

隨著軍事科技化的腳步加快，軍事科技使得一些原本就存在的倫理議題慢慢地在社會中發酵、擴散，同時它也帶來一些新的倫理議題。我們每個人都必須選擇要和誰產生道德的關連，要受到那一些目的、規則與美德的指引（Beck & Murphy, 1994）。而每一個這類倫理學原則都集中了它在不同倫理學體系中得到的解釋，這些解釋在當下的這個原則上相互吻合、相互支持，所以它們成了會通不同體系的重要倫理學視角（perspective）。在這一意義下，倫理理論也可以說代表了人類的基本道德經驗，不但是我們討論道德爭議時應有的共識基礎，也是一切道德理論是否完整或相應於我們的道德要求的試金石。

再則，倫理思維理論性前提批判的展開有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對於習以為常、未經理論審查的倫理觀念，進行嚴格的甄別，以便析出在理論上可以完全成立的倫理規範。另一個層次是對於合理的倫理思維有制約作用的倫理理論基本預設，加以分析性陳述。因此，制定倫理決策的大前提是決策者一定要意識到倫理議題的存在，而這種能意識到倫理議題存在的能力，即是所謂的倫理敏感度（Ethical Sensitivity）。更明白地說，倫理敏感度係指能在相關決策制定之前，察覺或識別出潛藏於週遭環境下之倫理議題的一種能力。

總結而言，倫理理論在實際的抉擇困境中，並不提供什麼公理系統，使我們推演出該做什麼的義務，相反地，倫理理論是使我們了解做抉擇的處境，使我們注意到一些被忽視、低估的因素，幫助我們弄清楚問題以供更進一步的探索。因此，以倫理（理論或原則）作為一個決策工具，是一個很「鈍」的工具。不過，把倫理原則弄透，找到原點，進而追尋一種像精密的機器一樣精準的倫理操作原

則，這樣的追尋本身也不是沒有實益。關鍵在於實踐的原則和細則，不可能百分之百找到，而且像精密的機器一樣操作的態度，本身又會陷入倫理的另一個陷阱—僵化。故而，吾人（尤其是軍事院校教師）不可一昧的直接傳遞個人的價值觀或個人認為正確的價值給部屬（學生），而是必須協助部屬（學生）透過他們自身的認知過程去發展，澄清自己的價值體系，使此價值不但能引導部屬（學生）做出適當的判斷，更能協助部屬（學生）從事積極的行為。

## 參考書目

- 沈清松 (1997), <論複製人的倫理問題>, 《哲學雜誌》, 21 期, 頁 232-254。
- 黃乃熒 (1994)。多元社會與教育領導典範的移轉。《菁莪季刊》, 6 期, 14-22。
- 黃慧英、方子華譯 (1985), 《道德思維》。
- 蔡文美等譯 (2000), 《媒介公正》, 華夏出版社。
- 雷克勤等譯 (1990), 《哲學的倫理學—道德哲學引論》, 北京: 中國社科出版社。
- 林朝成 (2005), <消費倫理與佛教新戒律>, 《第一屆應用倫理學術會議》, 玄奘大學。http://www.awker.com/ethics/data/meeting-art14.htm.
- 歐陽謙著 (1988),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哲學》, 臺北: 雅典出版社。
- 俞筱鈞等譯, (1993), 《道德發展—柯爾堡的薪傳》, 臺北: 洪葉出版社。
- 唐君毅 (1986), 《中國哲學原論 (導論篇)》, 臺北: 學生書局。
- 牟宗三 (1979), 《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臺北: 學生書局。
- Allchin, D. (1996). In the shadows of giants (update): Boyle's Law, Bunsen's burner, Petri's dish, and the politics of scientific renown. *Ships Teachers' Network News*, 7 (1), 1-8.
- Bailin, S. (1990). Creativity, discovery and science education: Kuhn and Feyerabend revisited. In Herget, D. E. (Ed.) *Mo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science teaching: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allahassee, FL: Science Education and Dept. of Philosophy at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 Christians, C. G., K. B. Rotzoll, M. Fackler, K. B. McKee, & R. H. Woods, (2004). *Media ethics: Cases and moral reasoning* (7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 Charles R. Kemble, 1973. *The Image of the Army Officer in America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p.202.
- Beck, L.G.& Murphy, J. (1994), *Ethics i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Program: An Expanding Role*, Corwin Press, Inc.
- Dutton, J. E.& S. E. Jackson, (1987). Categorizing strategic issue diagnosi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4, 307-323.
- Clouser, K. (1997), *Medical Ethics: Some Uses, Abuses, and Limitations*, from Nancy S. Jecker, Albert R. Jonsen, and Robert A. Pearlman, *Bio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93-100.
- Giddens, A. (1988)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 Ferrell, O. C., L. G. Gresham, & J. Fraedrich, (1989), A Synthesis of Ethical Decision Models for Marketing,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9:2), Fall.55-64.
- Hammen, C.L. (1977). Sex differences in the expression depressive responses on 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6, p.609-614.
- Hogarth, R. (1990). *Insight in decision-making*. New York: Wiley.
- Guy, M. E., (1990),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in Everyday Work Situations*. Greenwood Press, Inc.
- Koestler, A. (1941). *Darkness at noon*.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 Jones, T.M. (1991),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By Individuals: An Issue-Contingent Model*.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6, April: 366-95.
- Lambeth, E. (1992). *Committed journalism: An ethic for the profess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innot - Armstrong, W. (1988). *Moral Dilemmas*, New York : Basil Blackwell.
- Rokeach, M. (1968). *Beliefs, Attitude and Values*, Jossey-Bass Publishers.
- Tversky, A.& A.Kahneman, (1985). *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in Science*, 185, 1124-1131.

(投稿日期：98年11月16日；採用日期：99年1月28日)